

科技计划体系重构:期待“开关”开启

科技热话题

■本报记者 倪思洁

2015年,对于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来说,必将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去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一方案被不少人视为科技深改的“节点”,指出其触动了我国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优化布局的“开关”。

与往年一样,今年两会,科技体制改革仍是科技界的一个重要议题。自《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至今,30年已逝,改革迈入深水期。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调整的方向和细节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而其中将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也令人担忧。

新的曙光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计划存在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现象。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40个部门管理着近百个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跑部钱进”、多头申报、“九龙治水”“天女散花”等问题阻碍了科研效率的提升

和我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面对这些问题,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新方案,成了照进科研界的一缕曙光。

“国务院发布的中央财政计划管理改革方案,对原有各计划存在的重复、分散设立项目,避免碎片化等突出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引起了全国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如何实施是大家热盼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研究员周玉梅告诉记者。

此次改革方案,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将目标定位于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体系,基本原则明确为“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

“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对于此次方案的价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如是评价。

第三方困局

这份6000余字的改革方案,被不少人浓缩成一句话: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国家科技计划将全面整合成五大类。“科技体制改革,首要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和顶层架构的设计。”顾逸东说。

他表示,政府应当在宏观的科技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方面做更深入的工作,根据科技发

展态势和国家需求,从顶层布局不同领域的总体科研投入,同时又对不同领域的科研投入分配进行统一协调。

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看来,政府部门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手”。“这是一次政府层面的改革。”郭跃进说。

《方案》提出,将建立统一的评估和监管机制,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绩效评估通过公开竞争等方式择优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结果作为中央财政予以支持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中介的机构,科学方面的中介机构就是咨询评估机构。但目前在我国,这样的中介机构的发展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让它发育起来,才能逐步替代部分当前的政府职能。”顾逸东说。

他表示,我国的咨询评估机构目前大多是从原来的政府部门剥离出来,再受政府的委托来做项目评估,工作并不完全独立。未来,要做到在评估项目、经费时,秉持客观、公正、科学、独立的立场,还有一定的难度。

其次,他认为,咨询评估过程,对参与咨询评估的专家的素质要求很高,因此,第三方机构本身的建立和成长还需要一定的培育过程。

不仅如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由于我国科研部门之间条条框框的限制,受部门利益、单位利益的制约,第三方机构想邀请到具有较高资质的专家并不是很容易。

拭目以待

目前,尽管《方案》已经出台,但改革的“开关”似乎还没被打开。《方案》自印发至今已经过去数月,接下来,《方案》将怎样落到实处,也令不少代表委员既困惑又期待。

郭跃进告诉记者,由于中央尚未出台明确的《方案》实施细则,地方也仍然处在“待命”状态,并没有开始具体的改革举措。

在优化科技计划布局方面,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尽管改革方案已经将科技计划布局划分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五大类,但这五类科技计划之间难免会有重叠,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加精心的设计,保证计划之间能够进行协调和动态调整。

此外,具备哪些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可以有资格被改造成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应当如何防止滋生新的权力寻租情况?国家科技计划全面整合成5大类,如果在调整过程中,遇到部门间利益冲突的问题,是否有可能阻碍整合的进程……

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出了同样的困惑。“有些问题也是我们想知道和了解的。”周玉梅说。

“现在是国务院出台了改革方案,但最后的具体操作可能还是要依赖于各个部委。如果不作很认真的调整,过去科技计划体系的格局将很难发生改变。”顾逸东说。

物理学家「盯上」小垃圾

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王珊

“我今年的提案与垃圾分类有关。”当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潘建伟说起他的提案时,记者有点吃惊。

潘建伟在回中科大任教前,曾在欧洲待过很多年。他对当地垃圾分类的细致程度印象非常深刻——70%~80%的垃圾均可实现成功回收。在潘建伟看来,这是节约能源的好方式。

但回到国内后,潘建伟却有点犯难了。因为他不知道有些垃圾应该往哪里扔。面对满大街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字样的垃圾箱,他有点愕然。“比如我吃了一碗泡面,里面还有几根面条没吃完,泡面盒子是塑料,面条却是生物垃圾,这应该怎么办呢?”

类似问题不止于此。潘建伟所住的小区也曾经号召大家进行垃圾分类,但是坚持没多久,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垃圾应该怎么扔。

为此,潘建伟让学生做了很多调研,以了解国外垃圾分类方法及回收率,最终他决定今年将这个问题好好地拿出来讨论,即重新划定垃圾分类,将垃圾分为塑料、纸张、生物分类。

“尽管是小事,我还是想提一提。我们的科学家暂时还解决不了能源缺乏的问题,因此希望通过回收利用,为科学家发掘及利用新能源营造更多的时间。”潘建伟说。

在他看来,人类最大的福利来自科学的进步,科学家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生活,一旦出现有用的发现,就会全力以赴为人类改造世界作贡献。

前段时间,潘建伟刚读了一篇爱因斯坦的文章,爱因斯坦在文章中说他每天都在提醒是普通的公民养活了己。这让潘建伟印象深刻。“我也是个普通人,也有小孩,也关心周围的事情。”潘建伟说,科学家做事情是为了造福人类,也会想办法去延缓问题的发展进程。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公众对其关注度也有降温趋势,但公众如果搞不清楚如何分类,依然是个生活大难题。潘建伟认为,只要加一把力,就可以将其变成近期能够实现的问题。

让潘建伟非常开心的事情是,只要是好提案,相关部门最终会考虑并落实。去年,潘建伟等人曾提出“科研人员出国不能完全按照公务人员出国考察来判定”等提案,最终都被采纳。



①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叶培建在小组会上发言。



②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顾逸东在小组会上发言。

③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律培在小组会上发言。

④全国政协委员、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连建宇在会场外。

⑤北京会议中心走廊茶几上,摆放了板蓝根冲剂和热菊花茶,充满人情味。

⑥敬业的记者们席地而坐,对全国人大首场发布会进行实时报道。

本报记者甘晓 陆琦摄



吉永华委员:必须扭转教授群体形象矮化的趋势

本报(记者甘晓)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在提案中指出,必须正视、扭转教授整体形象被人格矮化、尊严脚下的矮化趋势。

吉永华称,市场化导向已把教育“传道、解惑、授业、创业”逼成了商品买卖的过程,学界浮躁、沽名钓誉、虚假成风。他指出,个别教授气节退化,道德败坏,行为不检,被坊间讥讽“白天叫兽,晚上禽兽”。“常言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如果有几颗老鼠屎,一锅白花花的大米粥只能被忍痛倒掉!”吉永华强调,“教授尊严整体形象严重受损!”

吉永华建议,在机制上,公职教授的自然晋升和越级提升交由国家级同行同业学术团体评判或具备权威性第三方意见,以最大限度地贴近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社会公信力;在体制上,凡被提拔为校长和所长等局级以上官员,不得脚踏两只船继续挂名招带研究生,但应适度延长学术造诣较高的公职教授的退休年限;在法制上,要对“害群之马”坚决绳之以法。

达建文代表:提高服务质量 周末开窗办公

本报(记者陆琦)“目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普通职工的工作与休息时间一致,老百姓如果要去这些部门办理相关业务,就需要向所在公司请假,并且还存在‘跑一趟办不完,排一天轮不上’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生活。”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研究院院长达建文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共服务部门应提高为民服务质量。

达建文说,浙江省瑞安市、温州市,山东省青州市等地已经陆续推行周六、周日开放服务窗口的制度,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周六、日休息,服务窗口在周末关闭。

在不增加公务员工作时间的情况下,达建文提出如下建议:在保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推广公共部门与普通市民错时上下班;增加服务时间,公务员加班实行轮休制;加大网上办公力度,完善网上办公系统;采用多媒体广告之政府办公时间。

杨维刚委员:加快公园立法 建立管理体制

本报(记者倪思洁)“目前,我国现有世界自然遗产43处、国家级地质公园240处、自然保护区428处、森林公园779处、湿地公园429处、风景名胜区225处。但我国尚未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建议,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杨维刚表示,目前国家公园管理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依据。此外,还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功能重叠交叉的问题。“同一区域的保护区或公园,有的既是自然保护区,又是风景名胜区,还可能是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一园多牌现象突出。”杨维刚说。不仅如此,管理中不能很好地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导致过度开发甚至资源破坏。资源权属不清晰,利益关系复杂。

朱永新委员:推进家庭教育 多种模式并举

本报(见习记者郭奕)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提案中建议,把家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列支教育经费。

朱永新介绍,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已出现至少三种模式: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推进的山东潍坊模式;政府拨款、妇联牵头推进的广东中山模式;工委牵头推进的江苏淮安模式等。但就全国而言,家庭教育工作依然困难重重,没有专门法律、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家庭教育工作领导体制不顺,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难题。

他建议,进一步明确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家庭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通过理顺关系,努力促成家庭教育工作均衡发展、有序化的新格局。把家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快立法速度,同时推动社会机构加强对家庭教育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对电视电脑的影响、传统家庭美德等迫切课题的深入研究。

王东林委员:古代科考线路 亟待调查保护

本报北京3月4日讯(记者彭科峰)“徐霞客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考、探险第一人,建议国家加大对徐霞客游线的全面调查和保护工作,争取将徐霞客游线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这样阐述了自己的提案。

“过去,人们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线的认识不够。他所进行的探险、科考活动非常接近近代以后西方地理学的方式。”王东林表示,徐霞客走过的路可以看作中国古代仅有的一条科考线路。“我们把徐霞客的著作取名《徐霞客游记》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应该叫《徐霞客科考手记》。这样一来,它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王东林指出,今年他的提案是建议住建部、文物局、旅游局尽快开展徐霞客游线的研究、调查和保护。“徐霞客游线符合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的条件。”王东林最后表示,目前他正在寻求委员代表联署,已经获得20多名代表、委员的支持。